

洪文、春桥同志批示

(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

春桥同志批示：

建议市委将这封信（指上海警备区政治部秘书谢克成同志1974年4月2日写的反映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冷冷清清的信）印发市委常委、警备区党委常委，由市委召集两个常委开次会议一议，帮助警备区领导取得主动权为好。妥否，请酌。

洪文同志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意见，请转天水同志阅办。

*

*

*

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在警备区看大字报时讲话

(1974年6月28日上午)

马老讲话：

今天到警备区看大字报，向同志们学习，很受教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工放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同志们说：“三个半天的会（指警备区三大部从6月22日至24日揭发大会）开得很好”，我赞成这个观点，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是好的，正在进一步发展，我们支持同志们的革命大字报，支持揭开警备区六大非问题，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希望警备区领导在运动中取得主动权，起码来看看大字报，和群众谈谈，和群众站在一起，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徐景贤同志讲话：

上次看了大字报，今天是第二次，局面大不一样，机关同志行动起来，自春桥、洪文两位政委批示以后，冷冷清清的局面向为热气腾腾的局面，对这一局面表示高兴，表示支持。

大字报揭露了警备区、南京军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错误，说明原警备区及南京军区某些人“一贯正确”、“九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解决了”、“十次路线斗争中过的硬”的神话破产了，大门口《资料之一》的大字报非常好，表示支持，不是没有问题，问题很大，问题的根子在原南京军区主要领导人那里。

运动深入，要联系林彪路线进行批判。林彪1970年5月19日在总政部长以上会议讲，要派“丘八管秀才”，就是让执行错误路线的人管党，实行“军党论”，这样的流毒在我们警备区有没有？（众答：有）（注：周纯麟穿着草鞋到任时就说过：“我这个丘八要管秀才，管政治工作”。

有些人以“正确”自居。以我划线，林彪讲“九大行星围绕太阳转”，实际上围绕他转，有些人以他为中心拉山头，不仅在九次路线斗争中有，在十次路线斗争中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要上升到联系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来彻底批判，对原来的“结论”要进行批判，（注：结论系指“九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解决了”，“十次路线斗争中过得硬的”神话而言）政治部要批林彪“5.19讲话”，印出来发给大家看看，看看南京军区、警备区是怎样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预祝革命深入，取得革命胜利！

王秀珍同志讲话。

这是第二次来看大字报，是受教育的，小人物起来了，把盖子初步冲破了，表示高兴。

这二次来，是根据两位政委的批示来的，一是支持群众，二是支持已经站出来的领导同志，使领导取得主动权。希望广大干部、战士一起战斗，进一步把运动引向深入，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动得比较好的比较好。希望处一级干部同战士一起，把警备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揭开。对刘文学、陈士法的表态，比上次市委召开两个常委会有了进步，表示欢迎。马付政委，X参谋长，邢主任，你们都表态了，要言行一致，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响应两位政委的号召，真正把警备区路线搞正确。（系转抄，供参考）

压军内外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某些领导同志，反对一月革命夺权。

请看廖政国当时是怎样贯彻执行“无锡会议”精神的：当他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打算时，气急败坏和凶相毕露地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地都没有人种了。现在菜场上买不到菜，形势大好，白菜一斤四毛。这样闹下去，明年吃啥家伙。农民没粮吃，就要扛着扁担、锄头进城造反。

现在上海市搞得不行了，一个也不行了。十几岁的娃娃，毛孩子成了革命的了，我们这样的人，干了几十年倒成了不是革命的了。

现在到处都在搞夺权，这里也在夺，那里也在夺，什么人都想夺，我们都去夺呀！每个师分几个县，先把十个县拿过来。每个县增派一个加强连，武装一个基干连。端着刺刀，带着手老子，去参加辩论。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团还要准备一个加强营全付武装，坐着汽车，架上机枪，配上宣传车，作为机动，还要弄几十个人，搞个小班子，专门写布告、通知，那里砸了，就到那里去。

为了防止有人冲我们的机关，要调几个连驻进来，外面来冲，就拉出去辩论。院子里不行，就进大楼，一楼不行上二楼，二楼不行上三楼，再不行，就全都抓起来。

这时，廖政国紧接着介绍了×××军在无锡一个工厂支左的情况：是这样说的：嘿，他们干得好。支左人员先进去摸情况，尔后把一个连弄进去，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名单，带上手考拉着就走，接着就开控诉大会，震动很大。当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的气急败坏的情绪也达到了顶点，可以说是手舞足蹈，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大有马上就干一场才能解恨的劲头。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同志说：听廖的介绍，看廖的表情，内心十分紧张，汗毛直竖，满身发抖，脚肚子都软了。

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有人感到气氛不对头，事关重大，曾提醒和

建议廖，要他向塔桥、文元同志汇报一下，同海军、空军商量一下，廖却十分反感地说：“这些人（指塔桥、文元同志）写文章还可以，搞这个他不行，等我们搞好后，再给他们说一下，就行了。”又提醒他注意中央已经总结和发表的黑龙江夺权的经验，廖又很不耐烦地表示说：“我们的情况与他们不同。”

尽管廖政国搞反夺权的想法和打算在警备区党委常委、全委会会议上讨论时，曾遭到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但由于廖政国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善于耍两面手法，最后还是按照他的路子走下去，实现了廖的如意计划。这就是“镇反就是最好的支左”之由来。这就是一九六七年上海，尤其是郊区刮起的那股“三月黑风”，镇压军内外革命群众，以及后来又多次反复、干扰和破坏上海革命大好形势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

我们认为廖政国的这番表演，绝不是孤立的，根子就是许世友主持召开的“无锡会议”。对“无锡会议”这个迷，本来应早就揭开，就是因为许司令等一些人捂着不让揭。现在到揭开这个迷的时候了。

许世友指使廖政国镇压军内革命群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警备区机关广大干部、战士看到廖政国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系列指示，死保走资派陈丕显、曾荻秋，疯狂反对一月革命夺权，干了许多坏事，群众意见很大，十分气愤。在一月革命风暴鼓舞下，机关干部、战士出于无产阶级义愤，自发起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廖政国的错误。“八条命令”下达，大家是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许多同志已奔赴支左第一线。

当时，廖政国代表警备区党委表示的态度说：机关的同志对警备区领导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对的，表示感谢，并表示绝不打击报复。但时隔不久，廖政国根据司令多次电话指示，竟背着春桥、文元同志和市委积极策划了所谓“天马整顿”。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许司令

给廖通电话，督促“整顿机关”，说“这是阶级斗争”。2月24日，许司令电话责问说：“你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上海，人家把刀子都架到你脖子上上了。”二月二十五日许又给廖通电话说：“你要把头全部抓起来，人家已经把手伸过来了，要把坏人都抓起来”。三月四日，廖政围向许汇报十五师有联络站时，许说：“要追查，抓起来，枪决几个也可以”。三月五日许来电问廖：“你开始整顿没有，要把头抓起来，最后去劳动。要抓一批，判一批，杀几个。有人要实行阶级报复，你晓得吗？至于机关，可以重建，减少它三分之一，先整机关，后整小单位，再查十五师。人家要夺权，你为什么不知道，政治部更要注意。”

经过周密和精密策划，廖于3月6日、7日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关门闭窗，撤开秘书，研究所谓整顿方案。并于3月8日采取突然袭击，把司、政、后机关全体人员和在外支左的干部统统拉到天马山，以整顿为名，进行残酷镇压支持一月革命的同志。当天廖向许汇报抓后勤部政委汤以报时，许说：“我授权给你把他抓起来。”

3月9日，廖政围赤膊上阵，在大会上大放词，谩骂上海工总司等革命造反派是“牛鬼蛇神”，胡说机关一月造反是“反革命暴乱”，“是匈牙利事件”。污蔑机关干部是“亡命之徒”，“不穿美国军装的美国兵并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造谁反？毛主席又有给你们每个人屁股上拉根电线，按个电话机，战士就是要听班长，上海就要听我的。”廖一边骂，一边杀气腾腾地宣布抓人。先后在机关抓了42人（各区共抓了160多人）。

3月11日，廖向许汇报机关都有问题时，许说：“都有问题都抓”“你那里有大鱼”，“你那个政治部可以取缔，有几个抓几个，有的可以枪毙，有的可以剥掉军装，叫他滚蛋。”廖说：“抓多了没处放怎么办？”许回答：“可以送提兰桥嘛！”并授于廖“可以先枪毙后再报告”的权，还反复问廖：“你敢不敢干”？廖政围根据许的指示，对这些革命同志采

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搞逼、供、信，体罚、罚腿、坐喷气式，揪头发，搞昼夜“车轮战”，有的被斗得昏过去，还拉起来继续斗。同时，还不择手段的搞指供、诱供、逼供，制造“台湾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在后勤部指挥”等谣言，无中生有，有意陷害，并追查与中央文革和上海工总司等革命造反派的关系，并把这些同志关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由武装战士看押，不准放风、晒太阳，限制一切自由，甚至侮辱人格，权打胸别，进行人身摧残，更为严重的是，还动用专政机关，准备一批手铐、牢房，把三十名干部、战士武装押送到提兰桥监狱和海南路看守所，并填写了罪犯登记表。对机关其他同志搞人人过关、清罪，挑动群众斗群众，弄得人人自危。你们镇压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犯了严重罪过。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防止地方造反派来冲，廖还调了一个团的兵力，设了三道岗，查问来往一切行人和车辆，不准通信，打电话还要经过批准。警备区司、政、后机关的办公室全部查封、抄家。廖为了把部队思想搞乱，盗用司政后机关的名义，加上党委按语，先后给部队发了三封公开信，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并要各师、团和武装部表态，写支持信；造成部队思想的严重混乱。廖还把好几连部分干部、战士调到天马接受所谓“路线教育”，毒化部队。

廖政国疯狂镇压军内同志，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一月革命，反对新生的革命会。据廖政国说：“天马山整顿是许司令用电话请示过林×××的。”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许世友指使廖政国残酷镇压上海无产阶级造反派

廖政国根据许司令的指示，在残酷镇压军内支持一月革命同志的同时，又精心策划了镇压地方造反派的黑会，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反扑。1967年2月中旬，根据南京军区无锡黑会指示“镇反就是最好的支左”

的谬论，在天马开了一个黑会。会上由原青浦人武部政委、历史反革命顾中良介绍镇压反派的黑经验，廖政国在会议结束时，对镇压反派作了具体部署。

会后，上海郊区很快刮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的逆流。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大批参加一月革命夺权的群众组织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不少的造反派头头被打成了反革命，砸牌子，抓头头，搞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仅青浦县，就砸掉了号称十万队伍的30多个群众组织，在宝山县横沙岛的驻军，一个晚上就把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砸了。其他各县，抓造反派头头，少者二、三十，多者七、八十，同时，积极支持赤卫队，竭力为走资派开脱罪责。由于你们推行了这条错误路线，造成了两派的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严重恶果。这种情况不仅郊区有，市区也有。

1967年4月，中央下达了“十条命令”，春桥同志指示警备区领导要到各县去处理好“平反”工作，廖政国虽然派了一些领导同志下去，但由于不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对“镇反就是最好的文左”的反动谬论，没有很好的进行批判，说什么：“抓也对，放也对”，所以流毒很深，一直影响到历次运动，总是千方百计整那些被迫害的老造反，有些甚至被审查四、五年之久，作为“5.16”揪揪，这个问题至今未很好解决，影响了大好形势的发展，其根子还是在许司令、廖政国身上吗？

许世友在上海“四·一二”炮打事件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1968年4月12日，在林彪死党的策划下，上海刮起了“炮打”张春桥同志的严重事件，当天上午，廖政国躲在家里，用电话指使机关的某些人，到社会上去收集“炮打”材料。晚上又专门召开常委会分析“形势”。有人宣读“炮打”材料，廖都 不作声。张宜爱同志传达市委四

点通知（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廖却反说：“你急什么，就是你聪明”？拒绝向下传达，相反，廖政国向部队传达来自许司令的“六点通知”，其中规定“在地方支左的部队同志要听军队指挥”，当有人问到张春桥同志是不是警备区政委时，可以回答不知道”。这是什么话？春桥同志不仅是警备区的政委，而且还是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许司令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争眼说瞎话，用心何在？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为什么在“四·一二”炮打事件中，廖政国拒不传达市革委会的四点通知，不接受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而强调听军队的，搞垂直领导，推波助澜，制造混乱，用意何在，不是发人深思吗？

许世友指使廖政国利用办学习班推行

“倒许乱军” 错误口号，分裂军队，破坏团结

“四·一二”炮打事件发生不久，廖政国奉许司令指示，经过精心策划，以办学习班为名，突然把警备区机关干部和在地方支左的人员全部撤回，追查支左人员与市革委会领导同志的关系，扬言“要创大树，率小猴”矛头指向中央负责同志，廖政国在学习班上，大肆鼓吹“倒许乱军”“倒廖乱军”的错误口号，以我划线，搞“稳军派”与“乱军派”，人人站队划线，分裂军队，不择手段地查“黑线”查“黑会”、查“黑人”、查“黑店”、查“黑材料”，把革委会郊区组污蔑为“黑风口”，把市政法指挥部污蔑为“黑店”。

廖政国在大会上公开说：“南京出了王、林、鲍，搞“倒许乱军”，上海也有人搞“倒廖乱军”，反对我有什么，我是执行许司令员指示的，反对我就是反对许司令，反对许就是反对毛主席。”

在“倒许乱军”、“倒廖乱军”的错误口号下，以对许、廖的态度为划线，把跟廖政团、许司令的人，不管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错误，一律封为“稳军派”，成为建军的“骨子”；而把支持上海一月革命夺权，抵制许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都打成“乱军派”，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不择手段地进行残酷斗争。更为恶劣的是以“献忠心”的名义搞所谓“斗私批修”，要大家坦白交待“倒许乱军”，“倒廖乱军”的活报，追查与市革会、工总司和地方造反派的关系，否则，就不准“毕业”，不能出学习班的大门。同时，大肆宣扬许司令如何一贯正确，要所谓的“倒许乱军分子”学习《我们的好司令员许世友》一书。人民解放军是个整体，为什么要分裂成这个派，那个派呀！军队内部谁有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不能因为有什么错误就分派，分派就是分裂军队。对“稳军”、“乱军”也要作阶级分析。稳要看你稳了什么，是稳了毛泽东思想，稳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稳了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思想！

请回许司令，你推行的“倒许乱军”的错误口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分裂军队，破坏军政、军民关系，到底要干什么？

许世友调上警到南京办学习班，搞反动的多中心

把矛头指向上海市革会和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六八年八月九日，在许世友同志的命令下，上海警备区到南京举办学习班。这次办班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学习班不组织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而把许的讲话作为每天必读的内容，在“稳军与乱军的斗争，是当前的路线斗争的焦点”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竭力推行“倒许乱军”、“倒廖乱军”的错误口号，大搞“多中心论”，层层站队，“以许划线”。继续镇压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到南京之后，根据军区所谓“三个乱军”的原则下，用部队整机关的方法，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廖政国背着春桥同志，背着党委常委的大多数，在警备区小礼堂召开了“稳军骨干”会议，进行了部署。为了大量那些“乱军分子”不顾当时地方工作的需要，一律“揪回来”，正如廖讲的“许的决心可大了，不管你在那里，统统弄回来。”这次学习班把党委碰过，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由廖政国亲自指挥。学习班一开始，就大放南京军区“积代会”的录音，先把大家思想搞乱，接着许司令在警卫森严的情况下，登场训话，在会上大骂所谓“乱军分子”，什么“削尖脑袋想当响当当的革命干部，我连顶草帽也不给你”，点名定调子，说什么“上海问题不简单，油水很大”。最后威胁群众说：“你们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到我家里，每人三杯茅台酒”。以后军区联络组的同志就反复要大家进一步理解许的这个“指示”的意义。要大家看到常委（指所谓乱军的）比例大、线条、线长，问题复杂性和严重性。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上下左右都有联系，是全国、全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乱军夺权。乱军就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学习班整天搞“查黑线、查黑人、查黑店、查黑会”追查支左人员与上海革命群众组织^是怎么联系的。与市革会领导同志是怎样联系的。当群众抵制这种错误做法时，军区联络组的同志胡说。对军区抱有怀疑态度。要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你们错定了，南京有乱军夺权，上海也有乱军夺权，上海是一个侧面，上海和南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葫芦，上海特殊是个大阴谋，甚至有的公开对张宜爱同志说：“你神气什么，这是在南京，而不是在上海”，“你现在不是市革会常委了”更为严重的是，把张春桥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批评廖政国在支左工作中有严重错误的一次讲话稿，也作为黑材料收交。

由此可见，南京办班是天马山镇压群众继续，对有些同志从政治上、

思想上进行教育，肉体上进行摧残。警备区政委于世炎同志，因为有一次田晋到上海，没有亲自到机场去接，即以对许“不忠”的罪名，打学习班里斗得心脏每分钟停跳近二十跳。连军区也主张让其休息的，学习班书记，原政治部副主任孙子守恶狠狠地说：“用担架也要抬进会场，他还威胁群众说：“你就是木头，我也要刻你三分”。

于世炎对抗、分裂中央，一手推翻中央所定的铁案

一九六八年九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纠正许司令和军区党委在办班中推行的错误路线，把上警、舟蛾的学习班由南京调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怀，亲自圈阅了学习班的计划，并亲切地接见了学习班的全体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对学习班也很重视，针对南京军区的问题作了多次重要批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三〇”批示。

康生同志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对上警、舟蛾两个学习班的掩盖子，不接触实际问题，想草草收兵，安排了一个不象样的学习计划作了如下重要批示：“据我看，这个材料内容空洞，不接触实际，不接触上海、舟蛾当前实际问题，似不适用，我想这两个学习班不批哥、倒许乱军”的错误口号，不彻底解决“稳军派”和“乱军派”分裂军队的极端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不当当弄清和批评南京军区“积代会”的一些错误，那么，这两个学习班就学不好，就不能算完成学习计划，妥否，请考虑。”

李抓同志批示：“还有‘倒口乱军’、‘倒廖乱军’。”

彭理和曹怡同志都批示同意。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康生同志对学习班办公室的情况报告，作了两段重要批示，报告在讲到有的同志有顾虑时，康老批示：“针对等项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使他们心中要说的话都讲出来。”

在讲到“乱军”、“善于不服气”、“有怨气”时，康老在“怨气”二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示：“要向他们解释什么叫‘乱军’，执行错误路线，不是乱军，也不可能乱军。”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负责同志同意这个批示。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关怀下，经过大家的努力，初步揭开了管各军区领导机关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了廖政国的严重错误，揭发批判了“倒廖乱军”、“倒许乱军”的错误口号，对管各军区的问题基本上分清是非，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

但是，许世友同志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是抵触的。在学习班时，凡是涉及到军区的问题就揭不下去。如廖政国专案组成立后，工作很困难，军区的一些问题不准查。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途经到南京时，林军区机关召开的欢迎大会上，许世友同志不讲“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不讲毛主席在“九大”期间的一系列指示，只字不提如何贯彻中央首长对学青班的一系列批示，却反其道而行之，说什么：“有些人说北京的饭好吃，南京的饭不好吃，有什么不好吃”，“你们想把我搞臭，真是越来越昏，你们反我，可反出一个政治局委员来了”，“你们稍事捞不到捞到一把屎。”他全盘否定了中央办班和中央首长的一系列重要批示。正如，他在六九年宁央一月会议上，刚刚作过检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的检讨报告上批示：“能如此很好”。中央首长指出，关键在“能”字上。然而，许世友同志拒不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耍了两面派的手法，继续推行错误路线，越走越远。

管各军区纯良、刘耀宗等同志从一到上海，就忠实地执行了许的指示，根本不传达，不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不批判“倒许乱军”、“倒廖乱军”的错误口号，而是继续从政治上迫害所谓“乱军派”，组织上山山头，排挤打击“乱军派”，比廖政国走得更远，享

受“乱军派”两个司令部的纯粹、廖政国，执行的都是一条错误路线。

管各军区那里！

许世友“以我划线”搞宗派拉山头，大搞独立王国

许世友同志在军区召开的一次清查“五·一六”会议上说：“什么人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极端错误的，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关于要批判反动多中心“倒许乱军”的错误口号，其实质就是“以我为核心”，凡是拥护的，听他话的，就是革命的，凡是对许世友有意见或对他所信任的人有意见的，就是不革命的，在这种错误指导下，不是积极贯彻“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而是继续搞什么“稳军派”、“乱军派”分裂军队；不是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小圈子；不是搞任人唯贤，而是搞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军区政治部干部副部长田普就说过：“要把她头或全部除掉，造反的一个也不留。”这句话完全反映了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暗心里，说明了她对革命群众的敌视态度，完全是孔老二的语言。

在这位副部长直接领导下，对所谓“稳军骨干”加封重用。例如，对积极推行错误路线的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孙于宇、司令部副参谋长董志诚、后勤部副部长罗玉琪都得到了重用，分别提为警备区副政委、南京装甲兵副司令，浙江建设兵团副司令。又如对保旧上海市委有功的某师师长周琪云，原分配江苏省军区当副参谋长，他不愿去，田普就安慰他说：“你先去嘛，以后提你当副司令”。果然不久就当上了副司令。

为了改组上警领导班子，周纯麟同志一走，就带了一批人，从副司令、副政委，到办公室副主任，到机要处长，还把南京办班和中央办法的，执行错误路线很积极的，从头参加到底的吴××，因保许有功，连升两级当了干部处长，掌握人事实权。

周纯麟、刘耀宗、杨新亚、章尘等同志忠实地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完全实现了廖政国的“复员处理一批，调离一批，提升一批”的具体方案，只要他们认为是在拥护许世友的，是“稳军”的，不管历史

上有严重问题，有右派言论，腐化堕落，都可以重用，有的还安排到关键岗位上担任领导工作。

对待地方支左的干部也是同样，凡是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支一派，压一派，严重违法乱纪的，地方群众有很多意见的。但只要拥护你们，又不揭发你们的错误，就可以把他们调回部队加以重用，或者把他们保护起来，不让革命群众批评，例如原徐汇区人武部长，竭力反对和扼杀上海民兵这一新生事物，曾受到洪文同志严厉批评并责令其作深刻检查，但就在这个时候，却把他调到部队，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市委责令他回单位检查时，章尘还气焰嚣张地对抗市委指示，亲自打电话给市委，不让他回来。

组织路线是为政治服务的，你们这样做，究竟要把上海警备区部队引向那里去？

许世友把南京第五次党代会引向了何方？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许世友的错误，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召开了了解决南京军区和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同时中央领导同志对军区政治部、上海警备区、舟乘要塞区在京三个学习班，作了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彻底批判了许世友执行“倒许乱军”，人为地划分“稳军派”分裂军队的错误路线，为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但是，许世友大耍两面派手法，在毛主席、党中央面前认帐作检讨，回到南京就变卦。1969年7月南京军区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就是向中央翻案的一个铁证。请看事实：

一、这个会议极力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中央的指示精神，拒不向党代会传达中央“一月会议”精神和中央首长的两次重要批示，使这次大会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大会引向了邪路。这是你经常自我吹嘘的“忠”“跟”吗？

二、在这个会议上许世友避而不谈自己所犯错误的实质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却上推下卸，欺骗愚弄党代表，比如：明明是自己推行了“倒

许、乱军、夺权”，人为地划分“乱军派”、“乱军派”的错误路线，而只是轻轻写地说成是“传播”了这个错误口号；你明明是制造浙江右倾复辟的主谋，而仅仅说成是“偏听偏信”；明明是你大搞分裂党的活动，而倒说是“上丁×××、×××人的当。”这是历史的事实吗？不！这完全是骗人的废话！

“不顾许多党代表的反对，利用高压手段，强行通过对抗中央‘一月会议’精神，对抗中央首长重要批示的错误文件——‘工作报告’。对这个错误文件，有不少党代表提出很多的批评和修改意见。但是，许世友根本听不进去，多次召集各代表团领队开会，施加压力，打着‘为南京地区几千万人着想’、要‘顾全大局’，‘先通过后修改’的幌子，胁迫党代表一定要通过这个错误文件。这是你光明正大吗？”

“大力推行‘稳与乱’分裂军队的错误路线。许世友在会议期间，一面叫喊‘过去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一面又在抽掉阶级内容，不谈执行什么路线，却大讲什么：那些单位是稳定的，那些单位是不稳定的，那些单位是有问题的。继续贩卖分裂军队的私货，顽固地沿着你那条错误路线越走越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次的党代会，由于没有搞正路线，所以会议之后，在军区机关和部队中，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别的地区不谈，就上海警备区来说，自周纯麟、刘耀宗、章尘、杨新亚等人到上海后，就是按照许世友的错误路线干的。他们干了不少反市委、反中央领导的坏事，大搞以人划线排队，继续进行分裂军队的阴谋活动。这是有大量事实的，我们将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

曲增吉等十八人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温州地区革委会工宣队办公室御印

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